

严复与梁启超的女子教育观异同比较

王亮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严复与梁启超都是近代具有妇女解放意识的维新思想家,他们都大力提倡并鼓励女子教育,并且躬身于发展女学的实践,为女学的兴起做出了贡献。然而由于他们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以及时代的局限,他们在提倡女子教育的思想方面既有共同点,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他们的女子教育观念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

关键词: 严复;梁启超;女子教育;异同比较

中图分类号: G 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402X(2015)06 - 0063 - 07

DOI: 10.13408/j.cnki.gjxb.2015.06.009

严复和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思想家、教育家,他们都为中国维新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加快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们在为维新运动摇旗呐喊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理念和策略,虽然其中的很多设想并未付诸实施,但其所具有的开创性和导引性作用则不容忽视。例如他们提出的妇女解放和女子教育思想,不仅冲击了中国的封建伦理,而且还为国人的思维方式寻找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同时也为救国保民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在对待女子教育的问题上,同属于维新思想家的严复和梁启超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不少相左之处。

前人就严复在妇女解放和女子教育思想方面的贡献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对其为妇女解放事业所做的努力也给予了较高评价。虽然前人关于梁启超妇女解放思想及女子教育思想也有一定的涉及,尤其关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学界的不少前辈们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是将严复和梁启超放在一起,就他们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两人的女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却少有人涉及。另外,在研究二者女子教育思想的时候多数是从正面观点进行挖掘,对于他们思想的负面观点则着墨不多。本文拟就严复和梁启超二人在女子教育思想上的异同点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有助于揭开维新思想家

们在兴女学、促进妇女思想解放等方面所付出努力的冰山一角,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严、梁女子教育思想的共同点

自封建社会以来,男性为了保持自己在文化上的优势,也为了更好地控制女性,便有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教,使广大女性局限于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中,生活在皇权、族权、父权和夫权的阴影之下,广大妇女的知识水平在总体上也处于极端低下的状态。因而严复和梁启超在宣传维新变法的同时关注到了女子教育,他们为女学的发展做了许多宣传和努力。

(一) 女学与救亡图存

为了国家的自强与自力,严复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发展女子教育有助于国计民生,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他说:“必欲为根本之图,舍女学无下手处。”^{[1](P589)}“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家累轻,而后人有余力以事共事。或者可以挽回颓俗,转弱为强乎?”^{[1](P468)}梁启超的观点与之相似。其云:“甲午受创,渐知女学”,“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桎压,譬犹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邻室;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斥中国之羞也。”^{[2](P203)}他们认为发展女子教育是国家进步发展的基础,只有国民素质提高了,国家的整体实力才会强大;而举国四万万人口中女子居其半,且大部

收稿日期:2015-03-16

作者简介:王亮(1990-),男,河北唐山人,陕西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社会变迁与性别制度史。

分女性基本上是文盲,或者知识水平极端低下,无疑会影响中国的实力,因而发展女子教育对于提高全国国民的知识水平、文化水平,进而提升国民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使后来办学者有迹可循,为了使女学事业能够发扬光大,严复在创办完全女学时在给外甥女的书信中写下了豪言壮语:“大抵吾辈于此等事,不办则已,既办则虽千辛万苦,总须于社会著实有益,可与后来人取法。若不能如是,则无宁不办也。”^{[1](833)}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不无慷慨激昂地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昌而明之,推而广之,呜呼,是在吾党也矣!”^{[2](P203)}他们的这一腔热血和爱国热情成为了无数后来者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

严复和梁启超二人的救亡图存理念在他们为新创立的女子学堂所作的序文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严复在《女子教育会章程》的序文中大力支持女学的创立,为吕碧城创办的女子学堂呼号呐喊。他指出:“国与国而竞为强,民与民而争为盛也,非以力歟?虽然,徒力不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智。徒力与智,犹未足以为强且盛也,则以德。是三者备,而后可以为真国民”,“至于箫勺水火,号召风雷,取天地自然之利,合以助民之耳目手足,致劳半而功倍,使人道日趋于乐康,则慨乎未之多及也。”^{[1](P252-253)}严复认为国民只有“力”与“智”是不够的,还要有“德”,而“德”即是教育。他在这里充分肯定了教育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德”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论证出兴教育、兴女学对于国民素质提高、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而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向国民发出号召:“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步瀆,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2](P203)}他认为只要中国女学发展起来,国家富强的美好宏图的实现便指日可待。二人宣扬女子自强的理念,肯定女性的独立自主,这对于推进女学的蓬勃发展、促进女性意识的萌发有积极意义。

(二) 女学与胎教、母教

严复和梁启超在宣传女子教育的实践中十分注意胎教和母教。首先,严复和梁启超都认为母亲身体的健康与否关系到后代的身体素质。他们从保国强种的观点出发,认为我国要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提高我国人种的素质,健体强身,而国民强健的体魄又取决于母亲的身体素质。严复说道:“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1](P28)}梁启超也在《论女学》中写道:“故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2](P45)}他们认为只有母亲身体健康才能为国家诞生和培育良种健儿。除此之外,女学还被梁启超赋予了保国、保种、保教的意义,放到了国家能否强盛的重要地位:“今之美国,殆将近之矣。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2](P43)}在他们看来,母亲身体强壮,女学发展兴盛,国家便可富强。

其次,他们认为母亲不仅要给子女提供健康的体魄,还要注重子女幼年时期的教育培养,因为国民素质的高低与孩童时代的教育息息相关。孩童教育除了学堂教育,最重要的莫属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角色的最重要扮演者便是母亲。梁启超认为:“孩提之童,母亲于父,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2](P46)}要提高国民素质非提高母亲素质不可,要提高母亲素质非发展女子教育不可。他又说道:“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2](P44)}严复也持类似观点:“盖性无善恶,长而趋于邪者,外诱胜,而养之者无其术也。顾受教莫先于庭闱,而最勗莫深于慈母,孩提自襁褓以至六七岁,大抵皆母教所行之时。”^{[1](P589)}严梁出于宣传的目的虽对女学地位有所夸大,但母亲的教育对幼儿后天成长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

(三) 女学与“生利”“分利”

严复和梁启超等维新派大都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一半的人口即妇女群体是坐食其利的。她们没有掌握自我生存的能力,只能依靠男子的劳作来维持全家人

的生活。这样的后果从个人来讲是造成男性的负担与劳累,从家庭来讲是造成家庭的贫困和脆弱,从国家来讲是造成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积贫积弱,以至于国家衰败,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梁启超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道:“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女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勤之所入,不足以瞻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2](P43)}“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何以故?无业之人,必待养于有业之人。不养之则无业者殆,养之则有业者殆。”^{[2](P43)}严复同样有此感受:“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分任。迂流既极,男子亦不能自养,而又仰给于他人。辗转无穷,相煦以沫,盖皆分利之人也”,“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家累轻,而后人有余力以事共事。”^{[1](P468)}他认为一千多年以来由于男性用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以及女性自身知识水平的低下,导致女性“其愚者犷悍无知,无复人理;其明者亦徒手饱食,禁锢终身,而男子乃大受其累矣。”^{[1](P469)}严复和梁启超等维新派认为女性之所以“分利”是由于没有职业没有工作;只有女性接受了教育,也就是兴办妇学,教给她们劳动技能,使广大女性走出家门去工作,这样才能减轻家庭负担,减轻国家负担,从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二、严、梁女子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严复和梁启超的思想代表着同时期维新思想家们救亡图存的信念和理想,他们的女子教育思想也代表着同时期国人妇女解放思想的最高水平。面对着危难的国情,在救亡图存思想的指引下,他们在女子教育方面的理念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由于个人的经历和观念不同,他们在女子教育和妇女解放思想上又有着一定的差异。

(一)对待女权主义的态度不同

梁启超不但支持女子接受教育、走向社会,主动帮助女性摆脱束缚,获得知识,而且还支持女性自己解放自己,支持当时的女权运动。这一思想从他1922年在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的

演讲《人权与女权》一文可以看出。他在演讲中首先提出了“人”的概念,指出了“人”和“奴隶”的区别,然后提到了人权和女权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只有男子获得了公民权,而女性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所以广大女性为了争取人权而提出了女权的概念,她们也要争取和男子一样的权利,这也就是当今所说的女权运动。在梁启超的演讲中,他指出女权运动有两个主要条件,一个是自动,一个是有阶段。尤其是“自动”这一观点的提出具有创新意义,已经超出了严复等其他维新思想家们的妇女解放思想水平。梁启超认为,所谓自动就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妇女要自己站出来解放自己,而不是让一部分男性来推动女性解放。“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自动的程度何如。”^{[2](P3360)}

所谓有阶段,就是女权运动的发展要分三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是教育上的平等权,第二阶段是职业上的平等权,第三阶段是政治上的平等权。他主张,这几个阶段要循序渐进,女性只有获得了教育权,在知识水平和个人能力上得到了提升,才能具备和男性竞争的基础和水平。他说:“女权运动,无论为求学运动,为竞业运动,为参政运动,我在原则上都赞成;不惟赞成,而且十分认为必要。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2](P3361)}梁启超大力支持女权运动,既给予关怀,又给予指导,可以说梁启超的妇女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已经超越了维新变法时期的妇女解放和女子教育的思想水平。同时,梁启超也支持自己的女儿从事妇女问题研究和女权主义事业。他在给女儿梁思顺的家书中,对梁思顺的妇女研究给予了支持:“汝研究欧、美妇人问题,欲译书甚好,可即从事,我当为汝改削出版,顷吾方约一团体,从事斯业也。”^{[3](P44)}

与梁启超积极支持女权运动相比,严复对女权主义不感兴趣,也没有多少女权主义的概念,所以他的女子教育和妇女解放思想显得相形见绌,基本上还停留在早期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水平,而且到了后期,严复的思想更趋于保守,对于妇女和礼法的要求也愈发严格,甚至有了倒退的趋势。后来,严复与民国第一才女吕碧城有了接触,才对女权主义有了一定了解,但他

对女性的认识也仅仅是停留在对吕碧城个人人格魅力和才华欣赏的层面上,并没有因此而明确支持女权主义运动。另外,和梁启超相比,严复对女子教育的关注度也略逊一筹。黄克武先生即指出,严复早期的文章并没有特别强调女子教育,“在甲午战后所撰《原强修订稿》文中,他从‘鼓民力’的角度反对缠足,强调‘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注:《严复集》,28)。至于在‘开明智’、‘新民德’两方面,严复完全没有谈到女子教育或男女平权。”^[4]虽然后来受世风尤其是受吕碧城影响,他也开始大谈女子教育,但总体说来远比不上梁启超。

(二)对待婚姻自由的态度不同

严复虽然提倡妇女解放,并在诸如禁缠足、兴女学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他在对待妻子的家庭角色和女子婚姻自由方面的态度却很保守。在对待妻子的家庭角色上,严复所向往的是那种传统的贤妻良母型的伴侣。他对妻子角色的期待仍然是传统的,“居家无事,可以随时买些小菜,同孺儿等学习家常烹饪,此本是妇女们分内的事,他日持家,可省无穷气恼”^{[1](P772)},“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系做太太人天职,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1](P750)}严复一生中有过三任妻子,分别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任氏、比自己小 25 岁的江莺娘,还有续弦朱明丽。他一生中固守的是旧的婚姻观念和礼俗,他需要的是温柔体贴的妻子,并且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贤惠女人。这从他和第三任妻子朱明丽的伉俪情深之中可见一斑。严复仍然把妻子限制在家庭之内,这和他所宣传的对“新女性”的期待是矛盾的。“吾国禁女子干外事者,四千余年。干外事者,微论恶也,即善有不可。世变大异,至今思想议论,乃略殊前。顾女子行事,稍稍露锋颖,循常之徒,辄相视大诧,甚者以为宜诛。嗟夫!使吾国礼俗长此终古,则亦已耳。必以进步为期,凡此皆所必至应有者也,又何讶乎?”^{[1](P268)}他对外之于女性的宣传是应该走出家门,走出“分利之人”的角色,参与国事和社会事务,而对内则要求妻妾固守传统,做规范守礼的家庭妇女;对外宣传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理念,提倡一夫一妻,对内则自己继续纳妾。以此来看他的内心深处对女性的期待还是不变多于改变。

在对待婚姻自由问题上,严复也表现出了

保守的一面。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文中,他一方面积极提倡婚姻自由,“又如泰西之俗,男女自行择配,亦为事之最善者。中国守旧之人闻之,必以为怪。”^{[1](P470)}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自由的思想,而另一方面在私下里,在涉及到自己的家庭生活时,他又极力主张婚姻之事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反对婚姻自由,“鄙意欧美婚娶之俗,毫无可慕,即使与彼同俗,程度均平,亦非佳事。”^{[1](P680)}严复在写给外甥女何纫兰的一封信中提到吕碧城对于婚姻自由的想法:“吾一日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云:据他看去,今日此种社会,尚是由父母主婚为佳,何以言之?父母主婚虽有错时,然而毕竟尚少;即使错配女子,到此尚有一命可以推委。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我闻其言,不意此女透澈至此。”^{[1](P839)}从中可以看出严复对于婚姻自由的态度,他在内心深处还是保留着旧的婚恋观,连他自己的婚姻也是如此,旧式婚姻观念对他至深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剔除的。

与此相反,梁启超在婚姻问题上却比较开明。首先,他发表《禁早婚议》,阐述自己反对早婚的思想。他认为早婚有五大害。一是“害于养生”,“少年男女,身体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斫丧其元气,害莫大焉”。二是“害于传种”,早婚会造成“徒耗其传种力于无用之地”,而国家则“未有不悴者也”。三是“害于蒙养”,早婚时由于父母年龄尚小,不能更好地教育子女,难以“为后辈之模范”。四是“害于修学”,人生中宝贵的学习年华都在此时期,“忽投诸春花秋月、缠绵歌泣、缱恋床第之域,销磨其风云进取之气”。五是“害于国计”,青少年过早地结婚由于缺少自己谋生的能力,因此仰仗父母,从而给国家带来负担。^{[2](P653-656)}

除了倡导禁止早婚,梁启超自己也严格遵守一夫一妻的承诺,对他的妻子始终如一。梁启超流落海外期间,认识了一位女性,并互有好感,但他“发乎情而止乎礼”,坚守自己的承诺。妻子劝他纳其女为妾。他在给妻子的回信中写道:“吾既以一言决绝,且以妹视之,他日若有所成,复归故乡,必迎之家中,择才子相当者为之执柯,设一女学校,使之尽其所长,是即所以报此人也。”^{[5](P126)}同时,梁启超还支持妻子参加女学

会的创办工作,尊重妻子的选择,让她参加社会活动。这与严复对妻妾束缚的行为截然相反。

作为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近代维新思想家,严复和梁启超在很多方面有着同时代思想家的影子,他们在思想上相互影响,在理论上相互吸收借鉴。虽然他们在女子教育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在一些理念上还是有着许多不同,尤其是对待女权主义和婚姻自由的态度更是明显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

首先,严复和梁启超有较大的年龄差距。严复出生于1854年,卒于1921年;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两人相差近20岁,年龄的差距让两者基本上属于两代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列强的侵略一步步加深,基督教和天主教等西方文化进一步渗透,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亡国灭种的危险也愈发深重。这20年正是中国经历深刻变革的时期。两人经历的时代变迁和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让他们的思想既有交融又有排斥。

其次,虽然两人在当时的思想界均为引领风骚的人物,但严复与梁启超的交往主要是在思想上的交锋,两人的观点和理念虽然有共同之处,但还是有许多摩擦。在维新时期,由于严复资历较梁启超为深,所以梁启超对于严复多以前辈相称。但是由于梁启超的一些观点如建立孔教会等和严复相冲突,所以严复对梁启超的批评多于赞同。这在梁启超写给严复的回信《与严幼陵先生书》中可以略见端倪。尽管如此,梁启超对于严复也是毕恭毕敬:“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谗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2](P177)}只是由于严复对于梁启超一直抱着批评的态度,所以两人关系并不融洽。

此外,严复与梁启超分属不同的学术派别,这也是二人关系不很和睦的原因之一。“严复传统学术的根基是师承吴汝纶的桐城派;任公则是源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与陆王心学。”^{[6](P274)}这也就导致了两个人在传统学术的理念上有着较大分歧,因而在后来维新思想的变迁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从两个人留下的信函以

及他人对其评价来看,严复与梁启超的关系并不密切,他们的交往也仅仅局限于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为了国家的前途知识分子间进行的一种思想交流,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私人感情,因而严复与梁启超在女子教育上存在着差异也就不足为奇。

三、严、梁女子教育思想的实践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严复和梁启超在女子教育思想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虽然二者具体在女子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专注于女子教育的实践,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们的理念。他们的这一系列教育实践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一)创办女学

首先,创办女子学堂,树立教育标杆。严复为创办完全女学,利用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积极奔走。严复自英国回国后先后担任过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安庆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校长等职,而在筹划创办完全女子学堂的时候他正担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一职。他应甥女何纫兰之请,同时也是为女学的兴办尽自己的力量,他多次向端方提起兴建女学一事,力促完全女学的创办。“月望前后,拟赴秣陵,掉此蹇足,以完全女学一说南洋端午帅。”^{[1](P830)}“晨问客座,吾提及两事:一是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又力劝此老兴办上海女学有完全国粹教育者。”^{[1](P832)}在严复的几经坚持之下,才致使女学创办“总有几分可望。”

梁启超为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中国女学堂而积极奔走。他作为中国女学堂的创办人之一,协助上海电报局经办经元善创办了中国女学堂。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时务报》上为中国女学堂做宣传和做学生动员,并且在上面刊登了《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同时介绍了国外的女学教育经验,扩大了中国女学堂的影响力,加深了国人对女子教育的认识。

其次,创立学校宗旨,为女学运行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严复认为,创立完全女学的首要目的便是培养女子教育的师资人才。“此校目的,要裁成头等女师数百人。”^{[1](P833)}在当时女学师

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培养女师自然显得极为重要,而严复在初定学校教员时也不得不用男教员,由此可见女教员的稀缺。“此校管理员用女,教员用男”^{[1](P833)}。他把学校的管理员定为女性,并且“管理员权最重”,这有利于女学自治,有利于女学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女性更好地走向社会。同时女校中西文并重,并涉及科学、卫生等,“此校重汉文、科学、卫生、美术,而西文则兼习。”^{[1](P833)}这完全是新式学校的管理制度,有利于女性接受先进教育,吸收先进文化。梁启超也认为:“办理宗旨,欲复三代妇学宏观,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所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故堂中一切捐助创始,及提调、教习,皆用妇女为之。”^{[7](P8)}总的来讲,创办女学校符合时代潮流,有助于女学发展。

再次,创办报刊,在刊物上宣传妇女解放思想。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在当时一段时期内这两份报刊都是妇女解放思想以及女子教育思想的宣传阵地,报上刊登了一些前沿的妇女思想理论,给国人传递了新的思想,对一些知识女性影响很大。在此之后的吕碧城等一批女权主义者就是在这股妇女思想解放浪潮中初步成长起来的。

(二)投身戒缠足实践

妇女缠足是封建社会的一大陋习,历来为维新人士们着力批判的对象。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视女性为犬马或花鸟,把她们看作掌中玩物,强迫女性缠足,以此来满足他们的病态审美需求。而缠足这种陋习对广大女性来讲危害是巨大的,不仅给她们带来肉体上的伤痛,还带来精神上的折磨。近代社会以来,缠足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贫弱的象征之一,成为了西方文明诸国抨击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之下,严复和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便对妇女缠足的旧俗发起了猛烈攻击。梁启超认为,缠足不仅使广大妇女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且还对女子教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中国之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不宁惟是,彼方毁人肤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2](P46-47)}严复也认为,对中国危害最深的是妇

女缠足与鸦片泛滥二事,“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1](P29)}妇女因缠足而导致拖累男子,所以严复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对妇女缠足持批判态度:“妇人既无学问,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分任”。^{[1](P468)}

缠足已经成为了女学发展的巨大障碍。梁启超认为“是故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2](P47)}戒缠足和兴女学二者相辅相成,所以严梁二人都认为废除妇女缠足势在必行。他们在猛烈抨击女性缠足的同时,也大力躬身到废除缠足的实践中。1897年,梁启超等人发起“不缠足会”,制定了《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并明确了立会的目的:“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光,革此浇风。”^{[2](P204)}从“不缠足会”的章程中可以看出,创设此会的首要目的就是废除缠足。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婚姻的出现,新女性的成长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传下,“不缠足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在上海不缠足会的带动下,长沙、天津等地都兴起了不缠足运动,这就大大促进了不缠足运动的发展。

(三)对女性晚辈的教育

严复和梁启超不仅大力宣传女子教育思想,而且以身作则,让自己和亲朋的女性后代接受教育,同时对女性晚辈也极尽疼爱。从严复写给其甥女何纫兰的家书及梁启超写给他女儿梁思顺的家书中便可窥一斑。这其中有关父亲对子女的关心,有长辈对于晚辈的疼爱。严复在家书中写道:“前得大媳家书,知汝遭小产,不知近来体气已否复原,舅心深为悬挂。”^{[1](P829)}“吾甥近日气体何如?肝风胃痛有发作否?至念至念!”^{[1](P841)}“汝病体近如何?何时可以出门探友?城内外有相宜西医否?许金婴似可用也。吾赴津不远,届时当告汝知之,兹不赘。唯万万珍重。”^{[1](P842)}“凡学书,须知五成功夫存于笔墨,钝刀利手之说万不足信。”^{[1](P831)}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汝必须顺承我意,若固欲速以致病是大不孝也。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吾断不许汝病也。”^{[3](P12)}“忽然想起来了,据廷灿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

‘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不知道他曾否寄给汝看。”^{[3](P52)}此外,也有长辈对晚辈学习的指导和教诲,“经济学吾曾为汝讲生产论,故此可稍略,交通论中之银行货币既有专课尤可略,然则亦易了也。”^{[3](P19)}“吾须欲汝侍我,然欲汝成学之心尤切也。”^{[3](P16)}梁启超和严复一样不仅让自己的女性晚辈接受和男性一样的教育,而且还对他们疼爱有加,寄予厚望。他在给女儿的书信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儿还得力十倍。”^{[3](P251)}在严复和梁启超的关怀和指导下,他们的女性晚辈大都摆脱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走上了女性解放之路,成为了近代中国的“女国民”;与此同时,他们这些女性晚辈们也都以新思想武装自己,走在了妇女解放之路的前列。

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同属维新派的严复和梁启超在女子教育理念上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为女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严复和梁启超在提倡女子教育上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如办女学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认识到了女学对于母亲胎教、身教的重要性,认为女学的兴办能够使妇女摆脱“分利之人”的尴尬处境,他们也都积极地参与女学创办,参加不缠足运动,并且对自己的女性晚辈的教育也非常重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经历的不同以及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和西方新理论的差异,导致他们在女子教育和妇女解放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在对女权主义的认识上,梁启超的观念更进一层;在对待婚姻自由方面,严复相对保守。总而言之,他们都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不可否认,诸如严复、梁启超等这些维

新思想家们不论是在自身思想解放还是妇女解放理论上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一方面,他们漠视妇女传统的工作,尤其是其在家庭中的工作。他们虽然是从国家富强发展、家庭丰衣足食的角度来看待女性走出家门的问题,但他们的观念仍旧停留在女性是男子附庸的层面,并没有看到女性在社会中尤其是家庭中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的妇女解放理论也缺少女性意识和女性体验。正如我的导师焦杰先生所指出的:“因为女人是被改造的对象,所以妇女解放理论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女性本身,女性与男性的差异被忽略了,女性的生活经验和女性意识没能体现出来。”“不论从经济而言,还是从政治而言,维新时期妇女思想考虑的都是女人要如何尽义务,而没有考虑女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8]

参考文献:

- [1]王栻,主编.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梁启超,著.段炳昌,吴松,卢云昆,点校.饮冰室文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 [3]梁启超.梁启超家书[M].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11.
- [4]黄克武.严复的异性情缘与思想境界[J].福建论坛,2001,(84).
- [5]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6]黄克武.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 [7]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8]焦杰.论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缺陷与不足[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3,(1).

[责任编辑:丁元]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an Fu and Liang Qichao's Views on Women's Education

WANG Liang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

Abstract: Yan Fu and Liang Qichao were both modern reformers with awareness of women's liberation. They both advocated and encouraged women's education, and engaged themselves in women's schooling, contributing to the rise of women's education. However, due to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they both have common points and som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education.

Key words: Yan Fu; Liang Qichao; women's education